挑担围鼓实物志

——田园调查手记之七·同心村

□ 叶继程

冬至日,我抽暇再次拜访挑担围鼓非遗传承人陈官保。长湖湿润的气息,漫过收获之后的田畴。村委会前的广场上,一面刻着“同治年间南乡(立新乡前身)张记造”的盘鼓被轻轻敲响,沉厚的鼓声穿过窗棂,与百年前黄儿高桥上的鼓韵遥遥呼应。这面布满包浆的老鼓,连同散落民间的曲谱、鼓架、照片,共同构成了挑担围鼓的实物年轮,在今天立新乡的沃野上,变迁着荆楚非遗的六百年沧桑,也见证着一代代人的生死契阔、悲欢离合。

挑担围鼓根植于楚地乐舞的千年母壤,广袤的云梦古泽,深埋着这份技艺最古老的基因——考古出土的陶鼓残片,胎质粗砺,绳纹印记深嵌其上,那是远古先民祭祀时鼓点的余响,而楚地“击缶而歌”的古俗,早已为其注入了悲喜皆可承载的文化底色。《楚辞》中“宫庭震惊,发激楚兮”的吟唱,并非遥远的传说——清代早期《沙市志略》记载“乡野祭祀,鼓乐相和”,而同心村传承人陈官保的祖传口述里,“鼓乐传自先朝,祭神贺岁、婚丧嫁娶必用”的说法,恰是这份文化基因的鲜活延续。彼时鼓乐尚未形成“挑担”形制,却已融入立新乡人的生命循环:春种祈愿、秋收庆典之外,红绸裹鼓的迎亲队伍踏碎晨雾,素衣执乐的送葬行列送别黄昏,锣钹声与楚地小调在湖网河埠头的炊烟中飘荡,为挑担围鼓的成型埋下草蛇灰线。其音乐体系更是底蕴深厚,沿用千年历史的工尺谱(由俗字谱发展而来),音名“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”对应简谱“拉西(低音)哆咪咪发索拉西”,阶名契合“宫商角徵羽”五音体系,分直音与腔音、讲究板眼与调式,全靠师傅口传身授传承技艺;乐器以两面盘鼓为核心,搭配土锣、土钹等七种吹打乐器成“十盘家艺”,司鼓手凭肢体暗语指挥,喜庆时奏《红绣鞋》《万年欢》,哀婉时奏《大红袍》《上字调》,形成独具楚味的生命乐章。

清代早中期,境域内挑担围鼓终于从楚地鼓乐中脱胎而出,成为独树一帜的民间艺术。乡野间流传的清代中期“十盘盒架”残件,榉木虽朽,莲荷与祥云的雕刻纹样仍依稀可辨,榫卯咬合的纹路里,藏着“一人一担、可走可奏”形制诞生的密码——迎亲时,这鼓架会披红挂彩、缀满绣球,与新娘的凤冠霞帔相映成趣;送葬时,则褪去装饰,露出原木本色,伴随后辈的哀思缓缓前行。这副鼓架的遗存,印证着“挑担表演”的独特形制,也成为连接生死两端的移动舞台。与之相伴的,是一本页脚卷边的清代晚期泛黄手抄曲谱,麻纸质地,墨字古朴,“川桪棹”“红绣鞋”的曲牌旁标注着“迎亲专用”,而“大红袍”曲名下则写着“丧礼奏,缓拍”,宫调转换间,分明是明清散曲与荆楚小调碰撞出的生命韵律。《荆州府志·风俗篇》中“沙市北郊一带,有挑担鼓乐,走街贺喜、送葬执绋,乐舞兼备”的记载,让这些实物有了文献佐证;立新乡朱氏家族族谱里“先祖以挑担围鼓为业,道光年间享誉城乡,迎亲送葬无不应邀”的文字,更勾勒出乐手们挑着鼓架穿行街巷,鼓点随红事的欢腾、白事的沉郁起伏的鲜活图景。

晚清至民国,是江陵县第一区(立新乡)挑担围鼓的黄金时代,留存至今的实物与文献,恰似一幅幅生动的生命民俗画卷。乐班合影老照片里,八位乐手身着蓝布衫,系着红绸带,挑着完整的“彩棚”鼓架,笑容质朴而昂扬——这便是迎亲时的装束,照片背后题着“民国二十三年,为张家迎亲记”,背景里的青石板路上,仿佛在花轿随行时看见鼓点起落,锣钹相和,交光互影的热闹场景;而另一张显斑的黑白照片中,乐手们身着素色长衫,鼓架无任何装饰,神情肃穆,旁边的手写注解写着“送李老先生物归”,印证着挑担围鼓在丧礼中角色位置的重要性。牛皮纸封面的民国手抄曲本合集,内页收录曲牌逾百首,工尺谱旁满是不同乐手的批注,“此曲宜庆寿”“迎亲必奏”“丧礼起灵用,三击鼓后吹唢呐”的字迹,约定俗成了曲牌与生命仪式的行规。泛黄的旧时请柬与讣告附件上,“恭请朱记乐班赴江陵寿宴演出”“敬邀张记乐班送先父归山”的道劲毛笔字,印证着《沙市民俗志》“挑担围鼓,立新乡为盛,楚味最浓,生死皆伴”的记载。老艺人陈官保的口述更添生动:“民国时,鼓队从北湖敲到沙市川祖宫……红轿迎亲,欢快的鼓点能敲落屋檐的冰棱,黑棺送葬,《大红袍》一吹,整条街户户燃鞭,为逝者送行。连长沙港(现长港路,原为通往便河的河道)边的渔船都停棹靠岸,垂首注目,生命的轮回在鼓乐中流转“。挑担围鼓的曲牌,传承着江汉平原对生死的朴素认知:迎亲的鼓点急促而热烈,是生命启程的号角;送葬的旋律低回而绵长,是人生终章的挽歌。这一喜一悲、一迎一送,恰似鼓面的正反两面,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生命图景。那些历经百年的盘鼓,既听过新婚燕尔的欢声笑语,也载过生离死别的无声呜咽,鼓皮上的每一道纹路,沉淀”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”的哲思——生是热烈的绽放,死是从容的回归,而挑担围鼓的锣鼓经,成为不灭的见证与温柔的慰藉。然岁月的风雨终究侵蚀了这份繁华。新政初始,挑担围鼓成为游行庆典队伍中最为炫目的亮点。上世纪50年代,虽仍在晒谷场、婚丧仪式上响起,却在后来那场浩劫中遭遇重创。陈官保用稻草遮盖在猪圈里的盘鼓,既敲过迎亲的喜乐,也奏过送葬的哀鸣,却只能在黑暗中沉默;朱家兴藏在灶膛夹层的手抄曲本,如今已虫蛀水渍斑斑,“红绣鞋”的欢快旋律与“大红袍”的沉郁曲调一同残缺,逾百首曲牌仅剩三十余首。20世纪90年代的民俗表演照片里,鼓队成员寥寥无几,“彩棚”鼓架简陋粗糙,曾经为红事雕刻的精美纹样不复存在,白事所用的素面鼓架也多有破损。立新乡文化站1995年的调研记录直白写道:“能完整演奏迎亲、送葬成套曲牌者不足十人,‘彩棚’工艺无传人”,《沙市文化简报》“挑担围鼓传承濒危,生死仪式中的文化载体亟需抢救”的呼吁,道出了这项非遗当时的危急处境。城市化进程中,高楼取代了土屋,厂房内轰鸣的机器声盖过了民间鼓乐经,婚丧仪式逐渐简化,挑担围鼓这陪伴立新乡人数代的生命乐章,渐渐被遗忘在时光的角落。

转机出现在2003年,一场抢救性保护让挑担围鼓重获新生。老艺人们从阁间、仓房里找到了蒙尘的鼓架,在墙缝中抠出了藏匿的曲谱,其中就有标注着“迎亲套曲”“送葬流程”的珍贵手稿。他们照着清代“十盘盒架”残片的样式,选用上好榉木,复刻出40余副挑鼓架,红事用的莲荷、祥云纹样与白事用的素面鼓架一如往昔,榫卯结构严丝合缝,重现了当年的匠心;收集整理的近百首乐曲中,特意厘清了迎亲、送葬的专用曲牌与演奏规制,“咚锵咚锵,楚韵飞扬”的喜庆锣鼓经与“三击鼓,慢钹,唢呐缓吹”的丧礼规程,一同被装订成《立新乡挑担围鼓非遗资料》系统留存。6个乐班重新组建,年过七旬的老艺人握着年轻学徒的手,教他们敲击迎亲的欢快鼓点,也传授送葬的沉郁节奏,年轻人们则用手机录下旋律,让古老的生命乐章有了新的传承载体。

2004年9月,立新乡“千秋岁月”(挑担围鼓)获湖北省文化厅第九届楚天群星奖(铜奖)。2005年,立新乡挑担围鼓在央视CCTV3、4、8频道播出。2007年,挑担围鼓入选湖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,吴生荣、陈官保、朱家兴等成为首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,传承人证书见证着这份承载生死哲思的文化荣耀的回归。

2019年仲夏,因为分纂《立新乡志》“社会风土”章节,我走进同心村,拜访了非遗传承人陈官保。老人摩挲着身边的复刻鼓架,眼神里满是欣慰:“红事的鼓要暖,暖得像新房的红烛;白事的鼓要沉,沉得像送别的脚步。现在年轻人愿意学,这些老规矩、老曲牌就断不了根。”如今的立新乡,有4支挑担围鼓队仍然活跃在乡村舞台:徐桥村2支、同心村1支、张沟村1支,红白喜事的场合里,总能看见挑担围鼓的身影。

挑担围鼓的实物遗存不再是孤独的古董,而是活态传承的生命见证。首届挑担围鼓艺术节的展演照片里,年轻乐手挑着复刻的“彩棚”鼓架,敲着祖辈传下的《红绣鞋》,再现着迎亲的热闹;而在村里的白事仪式上,他们身着素衣,奏起《大红袍》,用沉厚的鼓乐送别逝者,让传统礼仪得以延续。张沟小学的兴趣班里,孩子们握着简化的鼓槌,照着打印的曲谱练习,既学喜庆的迎亲曲调,也识沉郁的送葬旋律,迷你鼓架上的雕刻虽显稚嫩,却延续着楚地对生命的敬畏与认知。

立新乡文化站原站长刘胜告诉笔者:“这些鼓架、曲谱是生命流淌的物件,是立新乡人的精神图腾,装着一代代人的生老病死、喜怒哀乐。”确实,从考古出土的陶鼓残片到清代的“十盘盒架”,从民国标注“迎亲”“送葬”的手抄曲本到如今的教学道具,每一件实物都承载着挑担围鼓的前世今生,也镌刻着江汉平原对生死的思考。它们见证着生命的启程与落幕,记录着市井的繁华与沉寂,经历着岁月的挣扎与重生,最终在抢救与守护中,让生死轮回的哲思得以延续。

漫步在今日的立新街道,高楼林立间,仍能听见挑担围鼓的锣鼓经,声声传情:一声长,长有迎亲时的欢腾雀跃,一声短,短有送葬时的沉郁急促。起有清代鼓架的榫卯之韵,伏有民国曲谱的婉转之调。坚有老艺人的持守之念,固有年轻一代的传承之志。这份跨越六百年的文化遗产,不仅是立新乡的记忆,更是江汉平原的生命乐章——生是欢歌,死是静穆,而挑担围鼓的传承便是连接二者的桥梁,我们从那里来?我们是谁?我们到那儿去?(保罗·高更语)在鼓点与旋律中,代代相传着楚韵乡愁与生死智慧。

当最后一缕夕晖洒在立新街道文化站,那面“同治年间南乡张记造”的盘鼓静静伫立,鼓身的包浆在余晖中泛着温润的光。它曾见证过无数新人的欢笑,聆听过无数逝者的挽歌,经历过岁月的沉寂,如今又聆听着年轻一代的鼓点。挑担围鼓的百年历程,诉说着生的喜悦、死的从容。鼓乐声声,在立新乡丰饶的土地上回荡着,久久、绵绵、悠悠,宛如我们烙印在骨子里的乡愁。

文物传奇

张家山汉简:刷新认知的西汉『百科全书』

□ 张卫平

简为地库,藏历算律法鲜活社会;字作天书,载承楚启汉隐秘源流。提起“荆州简”,人们大多想到的,是战国时期神秘瑰丽的楚简。的确,荆州作为楚国最鼎盛时期的都城所在地,出土了大量战国楚简,以其独特的“楚系文字”,承载着先秦时期的思想与信仰。然而,“荆州简”的范畴,并不仅仅只是一个“楚”字。

多年来,以荆州为中心的楚地,还陆续出土了众多非常重要的秦简与汉简,共同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历史文字序列,成为跨越战国、秦、汉三代的文字宝库。其中,1983年出土于荆州张家山汉墓的“张家山汉简”,以其丰富的内容与颠覆性的发现,为我们揭开了西汉早期社会鲜为人知的一面,堪称一次改写中国历史的大发现。

张家山墓地,位于荆州古城西约1.5公里处的江陵砖瓦厂内。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,荆州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先后对张家山西汉墓地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,从五座汉墓里清理出竹简2366支。这些汉简,置于竹笥之中,由于受到淤泥的挤压,部分竹简已有损坏,卷束也已散开。考古专家根据竹简的堆积状况分析,这些竹简是各自成卷,堆放在一起的。简长30-33厘米,宽0.6-0.7厘米,各简之间,用三道线相连,各简文字多少不一,少者几个字,多者40多字,竹简共计1236枚,约40000字。包括《历谱》《二年律令》《奏谳书》《脉书》《算数书》《盖庐》《引书》《日书》《庄子·盗跖》和《遣策》等。荆州张家山墓地,宛如一座被尘封了2000年的汉代“百科全书”。其中多项发现,填补了历史的空白。比如:

——失传的古老智慧:最早的数学专著《算数书》。张家山汉简中的《算数书》,由约190支竹简、7000多字构成,是当时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数学专著。其成书年代,比著名的《九章算术》还要早100年。这部失传已久的数学著作,实际上是一部数学问题集,共有69个章题,大多数算题由题文、答案、术构成。算题包括分数的性质和四则运算、比例问题、盈不足术及面积体积计算等,有的算题早于西汉,是战国晚期或更早时形成,并有一些不见于《九章算术》的数学史资源。《算数书》比较系统地展现了西汉初年的数学成就,将中国数学史的具体实证大大提前。

著名数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先生曾将《算数书》中的数学思想与埃及、巴比伦、印度的古代数学思想进行过比较,并列出《算数书》优胜的方面。

《算数书》与埃及《莱因得纸草》相比:在数学思想方面,除反比例、单假设解题法相同,其他都是《算数书》见长;在计量、记数方面,《算数书》胜;在算法量多质精上,《算数书》胜。

《算数书》与巴比伦数学泥版文书相比:在长方台、楔形体的体积公式上,《算数书》完胜;在计量、记数上,《算数书》胜。

《算数书》与印度嘉那教建筑《法典》相比:在计量上,《算数书》胜;在算题算法上,《算数书》胜。

——律令中的鲜活社会:前所未有的制度细节。《二年律令》是张家山墓地出土的全部律令的总称,共有竹简526枚,是张家山汉简的核心部分。简文包含27种律和一种令,几乎囊括了汉律的主体内容,为研究汉初社会提供了第一手法律文献。尤其珍贵的是,其中记载了许多传世史籍中从未出现过的制度细节。比如:

“代户、买卖田宅,乡部、田啬夫、吏留弗为定籍……”《户律》中关于土地制度的记载,特别是关于“授田”“授宅”的规定及立户和登记的制度,以及“盈一日,罚金各二两”等具体规定,都是过去汉代史料中未曾见过的具体法律条文;

“大男,冬稾布袍表里七丈、絡絮四斤,袴二丈、絮二斤……”《金布律》中关于“户赋”的详细规定,以及“质钱”、银租、铁租、金租等矿产税目,揭示了早期汉代赋税制度的复杂性与经济生活的真实面貌;

“长安、频阳、临晋、成都……”《秩律》里则非常清晰地列出了汉初完整的行政地理区划,如同一张穿越而来的西汉区划图。其中,有些地名在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已不见了踪影。

这些律文,不仅让我们得以系统地认识汉初法律,更能与出土的秦律进行比较,非常清晰地勾勒出由秦入汉法律制度的演变轨迹。正如历史学家李学勤所言,“张家山汉律竹简的发现,不仅使我们能够系统地认识汉初法律,而且得以同秦律比较,研究由秦到汉法律的演变过程”。

——颠覆性的历史认知:“汉承楚立”的隐秘记忆。《奏谳书》共有竹简228枚,是议罪案例的汇编,包含春秋至西汉时期的22个案例。不过,在《奏谳书》里,最令人震撼的发现之一,则是那反复出现的“楚时去亡,降为汉”“楚时亡,降为汉”的记载。这些,完全颠覆了历史的认知,透露出“汉承楚立”的隐秘记忆,还反映了汉初时人们对王朝法统的看法。从而,印证了史书中关于的观念。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汉朝,是继秦朝之后,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重要时期。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,“汉”是直接继承“楚”而建立的,而非简单直接地承接秦朝。这,恰恰印证了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隐含的观点,即秦汉之间存在着以楚政权为标志的过渡环节,即朝廷与民间普遍视“楚”为秦、汉之间的一个独立政治阶段——“楚政权”。这一发现,为理解楚文化对汉代文化的深刻影响,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,揭示了历史记忆的另一个鲜活层面。正如清华大学研究员李均明所说:“通过张家山汉简,我们不仅能看到‘汉承秦制’,对比秦和汉的律法,也能看到汉初的制度设计,统治者施行宽刑薄赋、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,推动了社会进步。”

其实,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促进了世界文化传播,但纸张的脆弱,也令无数古代典籍消散于时光之中。幸好,在纸张普及之前,古人将重要的智慧刻写在了竹木简牍之上。这些简牍,历经地下数千年,如同被“石化”的时间胶囊,抵御了岁月的侵蚀。张家山汉简,正是这样的瑰宝。它不只是冰冷的法律条文或数学算式,更是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卷,让我们看到了汉初社会的运转机制、百姓的经济生活、官方的地理治理,乃至时人隐秘的历史观念,修正、补充并丰富了我们对于秦汉鼎革之际的认识。

当然,荆州汉简并非仅仅只出自张家山,在凤凰山、松柏、胡家草场等西汉墓葬中都有发现,特别是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,从胡家草场墓地出土西汉简牍4642枚,为目前单座墓葬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的一次。经初步梳理,这批简牍大致可分岁纪、历日、法律文献、日书、医杂方、簿籍、遣册等。其中,写在3000枚简牍上的法律文献,刷新了汉律种类和数量的出土之最,是目前出土的最为完整的西汉律典范本。而外乐律、蛮夷诸律等,为中国首次发现。此外,还发现了最早的医方汇编文献。其中用中药黄芩和黄连治疗病肠癖的方剂,是最早记录以黄连为主治疗下痢组方的出土文献。

荆州简牍,包含了从战国到秦汉的丰富典藏,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:中华文明的传承载体多元而坚韧。正是这些深埋地下的“荆州简”,让汉字的力量穿透两千多年时光,保持了文明密码永恒的张力,使我们得以与祖先的智慧和故事再次相遇,从而书写出“最荆州”的中国故事。

地名故事

龙口寨

龙口寨位于观音垱镇正北方的长湖南岸,其西,北两面濒临长湖,地处长湖最狭窄处。自古以来,人们把北岸的蛟尾叫龙尾,把狭窄的湖口叫龙口,把南岸突出长湖的村寨叫龙口寨,此处有木船摆渡,扼交通要津。长湖西通龙会桥(临小北门),草市(临东门),经沙桥门入沙市便河,北通汉水,南达长江,南北有此一水之隔,为兵家要隘。

三国时,蜀刘备借荆州不还,吴王命大将吕蒙率水军偷袭荆州,一路藏在长江御路口芦苇荡中,一路则隐蔽于长湖龙口,吴王两寨内。趁关公北攻襄阳,荆州守军空虚之际,两路水军一齐行动。御路口水军攻公安门,南门,西门,长湖两寨水军攻东门,小北门和大北门,南北夹击,四面围攻,加之荆州守将降敌,终于攻破荆州城,酿成关羽大意失荆州的千古憾事。

(高祖泉)

翰墨荆楚47

荆楚墨韵(作者 金伯兴)